
训政体制下商人组织与政治互动

——以汉口商会为中心(1929-1938)

刘杰¹ 郑成林²¹

(1.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南昌330031;

2.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 武汉430079)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通过修订商会法对各级商会组织进行改组。在剧烈的政治转型环境之下,随着民族危机逐渐加剧,汉口商会经历组织改选后在多个方面与政府保持着政治合作。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训政体制之下,汉口商会在国民会议代表选举以及应对民族经济危机等活动中仍努力彰显地方商人组织参政议政的功能。汉口商会充分发挥着其在地方商人与社会中的影响力和经济动员能力,以经济战形式积极引导汉口工商界抵制日货,联合地方政府建立国货委员会筹办大型国货展销。抗战爆发后,汉口商会更是发挥在地方经济社会领域的影响力,积极主动参与经济绝交,通过整合地方商界力量以集体行动公开支持抗战。

【关键词】:汉口商会 政治参与 国货展销 集体行动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9)06-0095-08

近代商会在组织发展与变迁过程之中始终与政府保持有密切之互动关系。清末民国时期商会组织从创设之始依附于政府到逐渐成为较为独立的法人社团。随着其组织治理体系的逐渐完善,职能的扩展,各级商会逐渐成为地方工商界维护商业利益,拥有社会地位并对政府形成一定程度制约的社会组织力量。在近代政局紊乱的背景之下,基于行业经济利益的诉求,各地商会组织发起一些具有政治参与色彩的集体行动。

自晚清辛亥革命之始,湖北地方政局变动频仍。作为长江流域重要港口城市的汉口商会基于商业发展与政治利益的考量,随着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势的转移与演变亦主动或被动的存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检视学界过往研究,从宏观上对近代商会、同业公会与政治关系研究成果较多。从事商会史、同业公会史的学者选择对上海、江浙、天津等近代商业大埠的商人组织与政治互动的

¹**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99);北京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项目(2018-Y04);江西省高校人文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D18022)

作者简介:刘杰(1987-),男,湖北荆门人,副教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郑成林(1973-),男,湖北红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社会经济史。

具体分析也较为充分。^②商会史研究代表者之一的冯筱才教授曾就商人与政治研究如何继续深入指出“讨论商人与政治之类的大题目,总体论的计划往往是不现实的,建基于特定时空的个案考察方能更清晰地展现历史”。^{[1]10}有鉴于国内商会史、商人组织史研究的日益精细化,对区域商会个案具体讨论仍存有其学术价值。本文选择以抗战前汉口商会为中心,结合国民党训政体制以及湖北地方政经环境演变实况,拟对汉口商会与政治互动进行具体的考量,以求进一步探析国民党训政时期地方政治变动与商人组织参与的复杂多维历史镜像。

一、训政体制下汉口商会的改组与治理结构调整

自清末汉口商务局筹组,因振兴地方商务而逐渐演化形成的汉口商会组织与地方政治之间一直存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为加强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商人组织的有效管控,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曾先后通过修订《商会法》,对各地商人组织进行组织架构再塑。随着国民革命由南至北的推进,长江中游最为重要商埠的汉口商会组织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复杂多变的政治变局之中。

1926年国民革命深入推进至长江流域。在广州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逐渐掌控了湖北政局。因国民党商民政策的双重导向,其实际控制区域内的商会与商民协会的纠葛不断蔓延。待及1927年宁汉合流后直接涉及到了各级商会能否进一步合法存续的问题。国民政府建政不久,汉口商会便呈请湖北政务委员会拟订和颁行新的商会法规以便作为组织存续的合法依据。南京国民政府为进一步加强社团管控,通过颁布全国统一的社团法令以及修订商会法、同业公会立法重建对商人组织的控制体系。^[2]经过综合政治考量,1929年国民党颁布“人民团体组织方案”正式确立了商会法人社团地位。新社团法令的颁布使得汉口商会逐渐摆脱了北伐时期商会与商民协会争夺合法性的纠葛。

1927年经过地方权力的洗牌与重组,桂系实力派胡宗铎、陶钧得以掌管湖北地方政权。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后,中央军进驻湖北,湖北及汉口地方政治渐为中央掌控。湖北政局变动后,饱受战争之苦的汉口商会对国民党中央执掌湖北地方政权从行动上予以了支持。在欢迎何应钦等中央大员的会议上,汉口商会代表黄文植等对中央进驻湖北及汉口表示出了热烈的欢迎,并期盼中央能够维护地方稳定的治理秩序。在国民党改组商会政令颁布后,湖北省及汉口市即依令积极督促汉口商会进行组织治理体系的改造。汉口市政府曾专门致电所辖区的会馆、公所依令改组为同业公会。与1929年上海商会与商民协会围绕改组所爆发的激烈冲突相比,由于汉口商界更多的为本地商人,各派系的政治势力介入相对较少,因此改组整体进展较为顺利。到1931年改组重设的同业公会达到了100多个,且均加入汉口商会成为其行业会员。在地方政府政治训导之下,汉口商会组织改会长制为委员制。依照商会法令设置专门委员会来具体负责商会的业务操作,先后设立提倡国货委员会、提倡节约委员会、统计调查委员会、调处公断委员会、劳资协调委员会。^[3]汉口商会因发展商务及政治经济活动需要所建立的专门委员会也获得了政府较大的支持,多个专门委员会亦有市政府成员加入其中。

在国民党训政体制框架下,全国各地的商人组织相继被纳入到统一的社团管理体系中。商会组织一方面在训政体制下寻求与政府良性合作,同时亦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管控。在汉口政府积极主导与参与之下商会进行了几次大的选举与改选。1931年2月新成立的汉口市商会举行了会员大会并进行首次选举。汉口市社会局专门派员前去指导。^[4]汉口商会亦遵循商会法令,提前将改选等事宜报告政府及地方党部备案并邀请其出席改选会议。市财政局长吴国祯、社会局长杨在春等人均出席。黄文植以商会领导人身份着重报告选举的意义在于“谋全市商业之进展”。^[5]市党部代表单成仪则站在商人参与训政立场强调“现在汉商会既有相当组织,各位尚须负责训练,仰副中央期望,以完成训政工作”。汉口市社会局局长则致辞寄希望商人担当责任,抵制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努力提倡国货运动。省政府主席代表宝振远演说:现在是商战时代,汉市居全国中心,关系重要,各位能认定潮流努力做去,必可挽危亡局面。汉口市政府各个部门亦曾派员参加正式成立大会。汉口市国货运动执行委员会还致电表示祝贺,称“阅报欣悉贵会举

^②①马敏、朱英等著:《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朱英:《“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9期;郑成林:《抗战前夕中国商会的政治参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彭南生:《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政治参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民初上海工商同业公会为考察重点》,《近代史学刊》第1辑;冯筱才:《近世中国商会的常态与变态:以1920年代的杭州总商会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等。

行代表选举大会，诸君以经济之才，兼商场之健将，素望所归，同膺荣选”。同时还号召商会委员共同提倡国货，共杜外资之侵略。^[6]贺衡夫当选主席，黄文植等当选为市商会常委。

依照新《商会法》规定，各级商会执行委员以及监察委员每届任期4年，每两年改选一次。1933年汉口商会进行了第一次改选。为彰显训政制度下政府对商人组织的管控，省政府、汉口市党部、市政府等都会委派官员出席相关会议。^[7]1935年2月20日举行会员大会商议改选事宜，选举黄文植担任新一届的主席。黄文植就任后发布了就职通函指出“呈蒙汉口市党部市政府派员莅会指导”，并表示自选举后协同执行委员以及监察委员等到商会开始办公。^[8]经过此次改选还专门成立了财政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政府财税政策的研究和讨论。

1937年3月，汉口商会进行了再次改选。汉口市政府吴国祯、市党部等循国民党训政体制下社团改选前例依然派相关人员出席改选活动。改选之前黄文植详细介绍改选规则，并强调满任的执行委员不能续选，满任的监察委员亦不能再次担任监察委员。^[9]此为抗战前最后一届商会选举。1938年10月，武汉全面沦陷，汉口的多数商人纷纷随湖北地方政府战略撤至恩施以及西南大后方，先前存在的商会组织基本上停止了组织运转。

二、参与“国大选举”活动，积极呼吁裁军止战

南京国民政府通过修订《商会法》意图建立对各级商人团体的垂直型管控。与北京政府时期因政治松散而商人组织活跃程度比，在训政体制环境下，地方商会参政议政的意识更多的受到了来自党令国法的严格制度限定。当然不可忽略的是，在地方政府政务运行中，颇有影响力的商业大埠商会在训政的合理空间下依然不断寻求集体参政，通过多种形式表达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和对时局的关注。随着汉口商会及其同业公会组织治理结构的完善，在国民会议选举以及应对民族危机等事件之上都显示了商人积极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自北京政府时期汉口商会即应地方政府之邀加入湖北及汉口多个政府政务委员会中，如汉口市政管理委员会、湖北官钱局清理委员会等，并在政府所主导的这些政治经济组织之中发挥着汉口商界的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汉口商会曾有多名代表被推举成为湖北省及汉口地方政府的参议，参与地方政府的财经与建设决策。鉴于商人在地方的重要影响，政府在决策之中亦多有考虑商人组织的作用。1929年汉口商会商议后推举会内成员万泽生、郑燮卿为政府参议。训政体制建立后，国民党试图在一党专政基础上通过公开选举以维持政权合法性。在国民党所颁布的《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中，商会组织整体被纳入到职业团体代表之中。对于各职业团体的选举资格与名额问题，汉口等商业大埠的商人组织曾积极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

对于政府所出台的选举条例，为维护商界政治经济权益，汉口商会曾就选举条例的制度缺陷提出质疑，认为“同业公会会员，依法均有店员之代表，店员既能推举加入公会，则全体店员不啻皆为公会会员，乃同一店员在代表则有选权，而在举出代表之全体店员反无选权，岂非有失情理之平，且以未免抑制过当”。^{[10]574-575}拟定的选举规则显然有损商人组织权益，天津等地商会为表抗议曾公开抗议并有宣布放弃参选。在地方政府协调下，汉口等市商会依照规定进行了代表选举，执行委员刘少岩等当选为职业团体的代表。

1936年在国大代表选举方案颁布后，因对选举区域划定存在分歧，汉口商会对于方案不甚满意。为此还专门致电行政院秘书处力争，吁请依照特别市行政地位，请政府准予汉口市为职业团体选举区域。鉴于汉口商会在全国商人组织的重要影响，负责选举事宜的行政院给予了回复并就未能执行汉口商会所提议进行了解释，称“汉口市非直隶于行政院之市，其职业团体之选举，自应归入湖北省办理”。^[11]汉口市在此次代表选举之中未获列名，行政院秘书处解释称代表名额的变动在于“汉口市早已改隶于湖北省政府，其地位自与南京上海等直隶于行政院不同，未能据以为例且职业代表名额业经明令公布，似未便率而改定”。^[12]虽然行政院并未同意汉口商会所提出增加代表的要求，但仍可见地方商人组织参政的积极诉求。

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并未完成完全的统一，各地军阀为争夺地方控制权不断混战。由此也引致各级政府军政支出常年规模庞

大。巨额的军政费用支出严重影响了国家建设各项事业投资。汉口由于处长江中游以及连通南北的重要战略要道，民国以来各派系武力争夺下兵灾尤为严重。早在20年代初汉口商会等认为裁兵救国关系至为重大，曾联合地方商人组织积极主张政府裁兵、督促制宪并公开财政。^[13]1929年蒋桂两派系在两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军事争夺。巨大的军政开支之下政府摊派公债、税收等严重影响了汉口商业市场稳定发展。在中原大战结束，各地政局基本稳定后，多地商会呼吁压缩军政开支，呼吁政府止战裁兵。天津总商会主张政府应将裁减军队节省的开支用来进行基础工程建设。因汉口饱受兵灾影响，对于天津商会裁军以进行经济建设的提议，汉口商会立即表态予以认同并积极支持。

巨大的军政开支严重干扰了国家的正常经济建设与发展。在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停战裁兵的期盼下，全国商联会、上海市商会、上海银钱公会致函汉口等地商会并通电全国，发起成立了废止内战同盟会并以商会为主导拟订了组织章程。为推进裁兵停战，汉口等地的商会、银行公会等商人团体对此提议均表示赞同。汉口商会积极通电全国，呼吁各军队能够积极发表停止内战意见，同时借裁军之际积极呼吁国民党能够革新政治，使得庶政公开以杜战源。^[14]转入训政体制的国民党亦开始着手通过裁兵等压缩军政开支，并重新对国家经济社会建设进行规划。这一转变，与商会组织的吁请不无关系。

三、发起经济抗日行动，政商合作国货展销

随着五四之后国内民族主义的勃兴，商人组织更倾向集体行动之下高举经济民族主义旗帜，通过商战、抵制洋货等形式维护国家的商业利权。在训政体制之下商人组织仍然寻求合法性的舆论及行动空间参与政治以求维护民族之独立。

1928年日本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后，汉口商会亦积极响应全国商界号召，公开宣布经济绝交。为汇聚商界力量，汉口商会组织召开各帮大会。为增加经济抗日力量，汉口商会公推商会周星棠为临时主席并商议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联合银钱公会严禁日币通行市面以及华商与日商通汇。由于采取了主动措施，抵制日货运动在汉口市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商界因济南惨案迅速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并积极提倡国货。11月28日，汉口各机关各团体选择在汉口商会召开联席会议。到会的有省市党部、市政府、汉口商会、银行公会等代表。与会代表共同筹议组织提倡国货委员会，并于其下组设国货展览及国货宣传周两筹备委员会。由各机关团体推选委员并议决汉口商会为主办机关。^[15]商界所主导的国货展览会拟全国巡展，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李宗仁专门致电工商部长孔祥熙阐述汉口为全国重要商业中心，请其“移汉展览，所有经费概由此间担任”。^[16]为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还派出张映南作为代表撰文上呈政府请求对于展销的国货予以减免商税及运费。财政部商议后亦准予并印制五联减税证书及五联减费运单一百份交与展销组织者。^[17]湖北省政府还下令建设厅拨款5000元作为经费。

1929年1月，在汉口商会及国货展销筹备处的积极呼吁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财政委员会拨付7000元经费并划拨汉口民乐园作为国货商场展销会址，由汉口地方警察局清理相关小商户后交与国货展览会进行国货的展销。汉口市政府颁布了武汉中华国货展览会提倡国货宣传大纲，详细分析了中国生产落后的原因，并指出提倡国货理由在于挽救国内千疮百孔的社会经济，直言“在打倒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第一步应努力于外货之排拒，第二步应该加紧提倡国货增加生产力”。具体办法如举办国货展览会、征收洋货消费税、组织国货调查委员会、组建国货贩运社等。经过汉口等商会的积极筹备，2月20日中华国货展览会在汉口民众乐园正式开幕。湖北省及汉口市政府对商人组织的经济抗战表达了支持。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翁敬棠代表李宗仁指出此次国货展览的意义：一可以交换关于制造国货的知识。二可以激发国民爱国心。一面要激发国民的爱国心专用国货，一面努力改良国货出品，抵制外货。汉口市党部代表张难先先后发言指出展览的政治意义。^[18]此次国货展览前后39天，数万商民参与此次国货的展销。国民党地方党政要员均出席此次展销，亦足见地方政府对此次展销的重视。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面对混乱的政治经济局势，商界不仅公开发表抗日宣言，还积极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对侵略的不满。不仅超越了“在商言商”的信条，其政治活动汇入民族救亡的时代大潮中。通过多方参与抗争以求发挥商人力量挽救民族危机。汉口商会致电政府“集中全国兵力齐赴国难。”^[19]9月27日汉口商会召集各业代表集会商议反日彻底办法。商会主席贺衡夫会上痛斥日本侵略，呼吁“各业一致团结救国，勿貽凉血动物之奇耻”。并倡议自即日起各业不许再私订日货，“万一有私订者当自严行制裁。”^[20]贺衡夫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汉口商会定将积极抵制日货，主打经济战。呼吁各业商人也应“自动停止购运

日货”。^[21]汉口商会还规定自9月28日起停止购买及起运日货并规定违者重办。

为有效抵制日货,振兴民族工商业,汉口商会代表广大商民利益积极投入到国货运动中,采取多种措施宣传和扩大国货的影响。以会刊《汉口商业月刊》为舆论阵地,登出多篇评论文章及商品广告阐述国货运动的意义。不仅使商民从思想上意识到推行国货的重要,而且还身体力行地亲自参与国货展销。为有效的推进抵制日货的行动,1933年3月组建提倡国货委员会。其目的如汉口商会主张成立所言“提倡国货为本会应尽之天职,当兹国难日亟,仇货充斥,尤非积极筹办不足以收实效”。商会执行委员会决议之后还从执行委员中选出7人,会员代表选出8人专门办理国货事务。随后提倡国货专门委员会进行宣传国货运动,也是颇有成绩,如报告所指“所有市面仇货,虽未能绝迹,而国货畅销得以逐渐推广”。^[22]

汉口国货展览会开幕后,汉口市商会、银钱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等商人团体积极参与会务。汉口市市长吴国祯特拨款万元支持此次展会。展览的厂商来自武汉和上海。参与展销的上海厂商78家,汉口厂商51家,货物种类45类,上千种商品。据不完全统计,20天总计出售国货洋169360余元。^[23]通过吸引市民进行现场观摩增进对国货的认识。有参观国货流动展览会感言“希望国人能从国货中多存将就采用之心,以免农村经济更趋于崩溃。”参与展销群众达40余万人。通过展览使得武汉市民对国货的政治经济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加强了使用国货的意识。有参会者撰文归纳认为此次国货展销价值在于号召国人“提倡国货杜塞漏卮,为挽救目前危亡中国之唯一工作,其重要远过于充实海陆空之国防”。^[24]

此外,汉口市商会还积极响应实业部以及地方政府号召,推荐国货厂商参加在上海等地展览会。从参展商品的种类与数量以及工商业者对展览会的支持来看,展览会对振兴实业还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5]抗战爆发前,汉口部分工商同业公会成立了提倡国货分会。1934年上海市国货陈列馆派遣推销营业主任章锦专程到武汉筹备国货推销分处。为表达支持,汉口商会迅速召集汉口布业、电料业等各同业公会主席讨论具体推销事宜,并就付款形式达成了一致意见。汉口市党部还联合汉口商会组成国货巡回推销团,“征求国货推销者,联合输送各地,一面展览,一面推销流动各地,其办法可以补救国货展览会之缺陷。”^[26]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汉口商会从舆论到行动给予政府抗日极大支持。汉口商会积极筹募1万元汇至十九路军。湖北省商联合会函电省内各地商会组建义勇军抗日,汉口商会亦积极响应,并表态称“商组商界救国会,为政府外交后盾”。^[27]汉口政府为支持汉口商会执行查核国货,武汉警备司令部专门颁布了相关命令,对汉口商会派出的国货查核行动予以支持。^[28]为更好组织抗日活动,1933年2月上海、汉口等地商会还发起组织联合办事处,加强联络以应对严重局势和救济工商业困境。^[29]

在经济民族主义旗帜下,汉口商会通过联络湖北省及汉口政府,通过舆论宣传、发起国货运动、积极联络各派政治势力等形式参与对外抗日活动。在抗战动员政治活动中,政府也多有运用商人组织等团体力量进行动员,在经济抗日问题上双方保持了良好互动。虽然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行动等不乏商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在民族危机时局中,汉口商会更大诉求在于通过参与国货运动、发动对日经济战等形式维护国家利权。

四、吁请政府积极抗战,发动商界支援抗战

随着国民党执政的逐渐稳定,在30年代紧张的时局中,为维护训政政权的稳定,政府亦展开了多项政治动员。如新生活运动、抗战经济动员等。在训政体制之下,地方商人组织的社会团体功能得以较为充分展现。政府为推进各项政治动员计划,亦较为注重商人组织在连接行业与普通商民的作用。政府与商会保持了较为密切的政治合作。如新生活运动中,汉口商会便多次联络商户、商店执行推广新生活办法。在训政体制下,汉口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组织仍努力利用合法的政治空间,通过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活动以求维护民族的独立。

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全国商界响应抗战之声,充分发挥商人影响力积极行动起来。湖北军政各界纷纷发表抗日通电。为表达对将士抗日坚定支持,汉口商会通电各地商会并呼吁“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面对国内政治危局,汉口商会电请政府主张对日全面宣战,伸张正义以制裁暴日。各县组织分会以及各业公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1. 对已定之仇货牺

性定款断绝往来,由汉商会组织提倡国货委员会,各业公会组织分会、2.通告厂商不得提高货价。3.将国货品名登报宣传。4.制止奸商从中牟利。^[30]

事变发生后,吉星文团长为国牺牲,汉口商会发表专电表示慰问,“我公英雄本色,粉身碎骨固所不辞。然大敌当前战云密布,尚乞我公善自珍卫,备作前驱。”^[31]7月13日,汉口商会召开临时执监委员会会议。商会主席黄文植在开篇报告中痛陈日本侵略行径,号召“凡我国民,或输财,或出力,或抒爱国热忱,不使利权外溢,以作前方守土将士之后盾”。^[32]参会委员一致表示认同。此后对抗战救国达成了具体行动协议。1.由商会先行筹借慰劳款2万元即汇前方,慰劳将士。2.组织不买私货委员会,扩大检私运动;3.集资5万元,筹设民众防毒器械厂。引导商界采取对日行动后,获得了同业公会及商人的大力支持。为表明抗战决心,汉口商会还进一步发表宣言,称“属会代表全市商民,誓以赤诚拥护最高国策,一致抗战到底,不达收回失地之目的不止”。^[33]

在汉口商会公开发表谴责日本侵略宣言后,汉口粮杂油饼业公会响应号召,宣布停止与日商一切交易,实行经济绝交,严厉防止粮食资敌。通电称“以团体之力量,一面对日商绝对拒售一切粮食,一面彼此监视,以免奸人愚弄”。汉口海味糖业同业公会亦响应号召,表态称:关于提倡国货一事,议决一致不进仇货。对于各家剩余之仇货,并议有两种办法。一是自动封存,二是以售完为限。同业公会内部赞成直接封存的情形居多。绸缎业、百货业等同业公会在商会支持下亦发布了拒售日货的宣言。

为增加各界增援前线力量,汉口商会致电全国各省市主张抗战并尽量宣传“爱国热心,务请一致主张,作有力之宣传,俾萃起而救国,同仇敌忾。”^[34]商会还积极联合下属同业公会致电前线守土将士疾呼抗战:“幸赖我驻军奋勇抗战,血汗成流,为民族争一线之生存,为国家保万年之疆土。粉身碎骨,万死不辞。凡我血气之伦,当誓为诸公之后盾。”^[35]国难危机之际,汉口商会致电宋哲元,请其“能平则和,不平则抗。政府民众当一致与我公共牺牲”。^[36]前方战事频频传来,汉口商会通电全国商界誓为抗敌将士后援,电称“御侮救亡,责无旁贷。作弦高之犒劳,效卜武之输财,各尽其力之所及,共赴国难”。^[37]汉口商会会员亦有撰文疾呼抗战。1938年1月5日,黄文植以商会主席身份,在广播电台发表题为“中国全面抗战与国际商业的关系”演讲,公开谴责侵略暴行,表示广大商人也“忍无可忍,只得以全民族的生命财产孤注一掷……为全民族生存而战,为全世界和平幸福而战”。^[38]

7月29日,为防止购买日货等形式间接资敌,汉口商会致电各业公会一致提倡国货,呼吁“当此国难严重期间,自非实行服用国货,不足以御外侮,而图生存。一致主张组织提倡国货专门委员会,并拟定组织规则,分函各业同业公会一律设立分会,藉收群策群力之效,以奏同仇敌忾之功”。^[39]汉口商会亦呼吁所属同业组织“此乃吾商界团结发动抗战之第一声。然后防之抗敌工作多端,实有赖于各业之通力合作,以充分发挥我商界抗敌之力量”。^[40]汉口商会将拟定的提倡国货各业分会规则下发给各同业公会。在其积极主导下,汉口多个同业公会相继成立分会以支持国货事业。提倡国货委员会的宗旨即是“以提倡国货自产自制自用,务使利源不致外溢,以达国货救国之目的。”该会主要办理国货宣传、商标、调查国货产销状况等各项事宜。汉口商会还联合湖北省商联会致电国联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请立即对暴日实施经济制裁以维护世界和平”。^[41]受此影响,汉口的日商洋行纷纷宣告倒闭。

七七事变后仍有部分日货走私销售于汉口市场。对此汉口商会会同下辖的同业公会制定了封存敌货的具体办法,要求涉事商店限期封存。具体办法两项:一、凡属仇货无论原料零星装箱封存须由该同业公会市商会加用封条。二是所有仇货封存数量应由该商造具清册三份,一份存商会、一份存同业公会,一份由商会呈交市政府备案。为扩大国货销路,汉口商会还争取政府支持组建了检查敌货队,旨在“遏止敌货来源而维国货销路。”武汉行营为表示支持致函湖北省市党部、汉口市政府、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省市警察局共同参与加大对国货的支持。汉口商会亦积极组建抗战将士后援会,从精神上与物质上给予抗战支持。经过商议筹组设立市商会慰劳工作团,推黄文植等13位委员负责慰劳具体事务。汉口商会与各同业公会多次商讨分帮摊派捐款慰劳将士事宜。12月9日,按照先前拟定的各行业劝捐额度,汉口商会致函各分会请其协助,称“前项捐款,须于三数日内,照数募齐。赶为制备,以应要需”。^[42]

汉口商会还积极联络众多的同业公会、社会组织以及有实力的商人进行抗战的大众捐募活动。此举得到了商界积极回应。裕华纺织厂职工及机修工人捐款5000余元。商会主席黄文植捐款5万元。各界在商会的组织发动之下积极展开捐赠,所捐达到数十万

元。为支援前线还专门召开了御寒被服大会,通过征募寒衣捐款办法交各个同业公会摊募并组织将募集款项送交征募委员会统一管理。国民政府为应对抗战需要发行救国公债。“值此冰天雪地,前方忠勇将士,浴血抗战,军需浩繁,凡有血气商人,自应体恤时艰,踊跃输将。”^[43]汉口商会积极组织各个同业公会摊募公债。104家同业公会共计承募救国公债11.3万元。汉口商会还组织在办公大楼等处搭台举行大规模募捐活动。民族危亡之下,商人团体举起抗日大旗投入到救国活动中。

五、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后在训政框架下通过修订《商会法》对各地商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再塑造。各地商会为顺应政治变动后的要求,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政府的改组政令,对已有组织架构进行重新构建。国民党训政体制之下,商会相对独立社团性质受到了较大限制。从整体观之,在训政政治允许的法律与社会活动空间下,地方商会与党政保持政治上较为良好的合作。商会及其下属的同业公会亦成为政府动员参与团体之一。在训政体制之下,汉口商会作为汉口工商界利益的代言人,在政局变动中公开代表商界发声,涉足政治活动,表达集体商业利益诉求。在法令与政令合理制度空间之内与政府展开政治合作,汉口商会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政治参与行动。在汉口市政建设、救灾与重建、国家与地方财税政策调整上多见汉口商会参与其中,并发挥着商人组织独特的影响力推进政府政策的讨论与执行。限于篇幅,将另文专述。

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变动以及商人观念的剧变,商人基于自身利益的综合考量参与国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在商言商”身份限定。二三十年代,在国民会议选举以及应对民族危机等政治活动中都显示了商会参政议政的功能。在五四之后民族主义泛起的时代,汉口商会及其下属的同业公会在地方税政、发展国货事业等具体事务中展示了商人组织政治诉求的表达与行动。在紧张时局中,汉口商会充分发挥着其在地方商人与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在商界中的组织动员能力,积极引导商界以集体行动方式参与抵制日货与国货展销挽救经济政治危机。30年代初期,湖北省及汉口市基本为中央势力所掌控。商会发起的经济抗日行动亦获得了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的积极支持。在涉及经济抗战问题上,湖北省及汉口地方党政部门与商人组织形成了共同的诉求与较为密切的合作。全面抗战爆发后,汉口商会更是积极主动参与对日经济绝交,并发挥在商界中的重要影响力,通过筹募捐款等集体行动公开支持政府抗战。

当然仍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训政体制下汉口商会在与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政治合作中亦时有较为剧烈的冲突存在。在国大选举、摊募财政公债乃至营业税、所得税的政策执行中,汉口商会亦曾通过电文吁请、联络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商人组织以集体抗议等形式反对政府的不当政令。汉口商会及其基层组织的同业公会在二三十年代常态与变态的复杂政经环境中,汉口商会组织在商亦言政,不仅在具体与商业有关的活动中表达了对地方经济长期稳定秩序的强烈诉求,同时亦站在政治的高度努力参政议政,展现了其对地方政治稳定的诉求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强烈伸张。

参考文献:

- [1] 冯筱才. 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2] 魏文享.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1927-1947) [J]. 开放时代, 2004 (5): 91-106.
- [3] 汉口市商会各项专门委员会组织通则[J]. 汉口商业月刊, 1934 (1): 131-132.
- [4] 汉商会今日举行选举大会[N]. 湖北中山日报, 1931-02-22 (3).
- [5] 汉商会昨开选举大会[N]. 湖北中山日报, 1931-02-23 (3).
- [6] 汉商会新选执监委员定明日宣誓就职[N]. 湖北中山日报, 1931-02-25 (4).

-
- [7] 关于重要事业之成绩[J]. 汉口商业月刊, 1934(7):87-92.
- [8] 黄主席文植就职通函[J]. 汉口商业月刊, 1934(4):132-135.
- [9] 汉市商会昨日选举[N]. 大光报, 1937-02-26(4).
- [10] 胡光明, 等.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册[G].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 [11] 关于国大选举法令释解[J]. 上海党声, 1936(21):7-9.
- [12] 公函行政院秘书处[J]. 内政公报, 1936(7).
- [13] 汉口商联合会劝导裁兵之热诚[N]. 申报, 1922-12-21(10).
- [14] 汉商会响应废除内战[N]. 申报, 1932-06-13(6).
- [15] 鄂设提倡国货机关[N]. 新闻报, 1928-11-30(6).
- [16] 国货展览会移汉[N]. 新闻报, 1929-02-27(3).
- [17] 迳复者顷准函开兹据武汉中华国货展览会代表[J]. 工商公报, 1929(9):63-64.
- [18] 工商消息:武汉国货展览会开幕[J]. 工商半月刊, 1929(6):5-7.
- [19] 汉口[N]. 申报, 1931-09-23(10).
- [20] 汉商会贯澈经济绝交政策[J]. 观海, 1931(4):2-3.
- [21] 汉市抗日空气紧张[N]. 民国日报(上海), 1931-10-14.
- [22] 关于重要事业之成绩:组设提倡国货专门委员会案[J]. 汉口商业月刊, 1934(7):87-92.
- [23] 本市国货流动展览会开幕[J]. 汉口商业月刊, 1934(3):156-162.
- [24] 李教之. 从汉口国货展览会的销售清算中观测国货前途[J]. 汉口商业月刊, 1934(5):11-26.
- [25] 张启社, 杨宁. 汉口市商会与抗战前武汉社会经济的发展[J]. 近代史学刊, 2007(4):133-140.
- [26] 汉市党部会同商会组织国货巡回推销团[J]. 国货年刊, 1936:58.
- [27] 鄂商组义勇军[N]. 申报, 1932-2-11(8).
- [28] 训令各队飭属保护汉口市商会调查冒充国货之调查员文[J]. 水警季刊, 1933(创刊号):115-116.

-
- [29] 市商会准备应付严重局势[N]. 申报, 1933-02-17(10).
- [30] 粤汉路发现汉奸破坏铁路[N]. 申报, 1937-07-31(6).
- [31] 电慰吉星文团长抗战负伤[J]. 汉口商业月刊, 1937(3):37.
- [32] 本会第二次临时执监委员联席会会议记录[J]. 汉口商业月刊, 1937(3):23-37.
- [33] 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之宣言[J]. 汉口商业月刊, 1938(8):22.
- [34] 通电全国一致主张抗战并尽量宣传[J]. 汉口商业月刊, 1937(3):40-41.
- [35] 电慰卢沟桥抗战守土将士[J]. 汉口商业月刊, 1937(3):35.
- [36] 电请宋哲元等坚决主张平则和不平则不和以维国脉而保疆土[J]. 汉口商业月刊, 1937(3):36-37.
- [37] 通电全国商界誓为抗敌将士后援[J]. 汉口商业月刊, 1937(3):40.
- [38] 黄文植:中国全面抗战与国际商业的关系[J]. 汉口商业月刊, 1938(8):1-3.
- [39] 函各业公会一致提倡国货[J]. 汉口商业月刊, 1937(3):38-39.
- [40] 信孚. 汉商界之抗敌运动[J]. 汉口商业月刊, 1937(3):25-27.
- [41] 汉商会分电国联美国请制裁暴日[J]. 中央通信社稿, 1937(10):455.
- [42] 分函各同业筹募捐款慰劳前方将士及来汉伤兵所需衣被[J]. 汉口商业月刊, 1937(6):36.
- [43] 武昌市商会催缴救国公债[N]. 申报, 1938-1-31(2).